

---

# 中美博弈无关文明冲突

——基于中美文明特性的分析

赵远良

内容摘要：文明在总体上可以分为零和型文明和非零和型文明。美国文明具有零和性与非零和性质的双重性，中华文明则属于非零和型文明。中美两国文明存在共同点，即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型国家，两国的文明体系中都存在不同比重的非零和性的特质。随着中华文明的逐渐崛起，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博弈在本质上是非零和型文明与半零和型文明之间的博弈，这为两国间形成洛克式博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中美两国文明的竞争与合作是洛克式博弈，目前的中美贸易博弈无关文明冲突。

关键词：非零和型文明、中华文明、美国文明、中美关系。

作者简介：赵远良，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编审，博士

何种文明类型占据国际政治的主导，这势必会深刻影响国家间博弈方式的选择。当零和型文明占据世界主导地位时，国家间的竞争多采取霍布斯式博弈方式。当非零和型文明从弱变强，逐渐成为世界的主导性文明时，洛克式博弈将成为核大国进行互动的合理方式。在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华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博弈从总体上是非零和型文明与半零和型文明之间的博弈，这为两国间形成洛克式博弈提供了条件和可能。

## 一、概念界定：文明类型及其划分标准

### （一）关于文明的概念

在学术界，对“文明”(civilization)一词的概念做界定实属难事。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很难将这个概念进行界定并达成共识，因为在“文明”与“文化”这两个概念上，我们就很难区别。例如，文化形态史观的代表人物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就将文化作为研究单位，认为文化是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基本单位，文化的最终归宿是文明，文明是文化的终结。<sup>①</sup>美国学者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则认为，文明是放大的文化，<sup>②</sup>而文明的冲突是世界范围内的。<sup>③</sup>

法国年鉴学派的代表人物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认为，文明是一个有着内涵丰富且长期存在的综合体。<sup>④</sup>人类学家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在定义“文明”时指出，它是由多个社会中常见的社会现象组成的，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且持续地相互接触，这些接触又是通过永久的维系或者共同祖先的关系而实现，文明是社会的集合体。<sup>⑤</sup>英国学者阿诺尔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对历史进行研究时确定的单位也是文明，他认为所有的文明是变迁的，但每一次循环在其内容上都会有延续与更新，

---

<sup>①</sup> [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齐世荣、田农等译：《西方的没落》，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sup>②</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6-27页。

<sup>③</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228-229页。

<sup>④</sup> [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肖昶、冯棠等译：《文明史纲》，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sup>⑤</sup> Marcel Mauss, *Techniques, Technologies and Civilisation*, New York: Berghahn, 2006, pp.61-62.

---

文明虽然会解体，但是也会复兴。<sup>①</sup>可以说，文明是复杂的，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正如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所说的，“文化或者文明本身是是一个最复杂的整体”。<sup>②</sup>

虽然文明的定义较难界定，且即便定义了也是各不相同（如上所述），但文明在其内涵上还是存在一些共同点的：文明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文明既有精神层面的内容，也有物质层面的基础。因此，笔者在本文中把“文明”界定为：在一定时间范围与地域范围内，在该区域内生活的群体经过历史沉淀而形成的对客观世界的适应过程、认知理念与客观存在。由于各种文明要素在时间和地域上的分布并不均匀，因而也产生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也就是说，基于不同物质条件和观念基础的文明，彼此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 （二）文明的类型与划分标准

笔者认为，根据文明所具有的内在特质和属性，在总体上可以分为零和型文明、非零和型文明和半零和型文明。接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判断和衡量何种文明是零和型文明，何种文明是非零和型文明？何种文明是半零和型文明？其实，有两个指标值得参考：一是该文明是否基于宗教上的“一神论”；二是该文明的机体组成是否为单一性民族国家（或族群）。

零和型文明是指，其文明的载体（如族群、部落与国家等）在对外交往过程中，主要以“零和博弈”的思维来指导其行为，以便谋取其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与扩张的文明。零和博弈思维则意味着一方的得利必然建立在另一方损失的基础之上。零和思维体现的是达尔文式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思维。由于西方文明基于一神论为基础，大多以相对单一性的民族国家（或族群）为主体，因此在类别上属于零和型文明。

非零和型文明是一种以非排他性的方法来获取生存和发展的文明，其文明的核心思维在于非零和性，其机体的发展与壮大主要采取的是内向式途径，而非向外进行武力掠夺或者强力占有等手段获得。温和性、包容性与非暴力性是其文明内核的一个重要特征。非零和型文明不崇尚丛林法则，也不喜欢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而是强调合作与包容，这种特性具有较强的同化吸收力和包容力。中华文明可以说是非零和型文明的代表。

还有一种介于零和型文明与非零和型文明之间的文明，则属于半零和型文明，其文明类型只是满足“一神论”宗教与单一性民族国家（或族群）这两个划分标准中的一个。例如，美国文明只满足“一神论”这个标准，而在民族构成上不满足单一性民族国家的衡量标准，故其属于半零和型文明。

世界历史告诉我们，何种文明主导世界，就会带来何种类型的世界秩序和国家间博弈方式。近500年来，西方文明主导世界，同时也带来了惨烈的战争与冲突。西方文明拥有的一个关键内核是零和思维，并以零和博弈为主要行为方式来进行对外交往，导致的结果往往是全球性战争与杀戮，例如全球范围的战争（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在西方文明占主导的历史时期发生的。

为什么说文明类型的划分主要基于宗教的“一神论”与单一民族国家的机体性这两个要素？主要分析如下：

第一，“一神论”与零和思维。在宗教信仰上，“一神论”（monotheism）由于只信奉神的

---

<sup>①</sup>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刘北成译：《历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版。

<sup>②</sup>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

唯一性，这就产生了不可逆的排他性。“一神论”的神本位宗教强调人在神之下，神与人完全不同，人只能选择对待神的态度，更没有成为神的可能。这种“一神论”的宗教在核心要义上缺乏包容、妥协，故血腥味较浓，导致其思维从一开始就是以零和博弈的方式来对待“他者”和认知世界的。因此，“文明”就成为其依附载体（如民族国家）侵略扩张的合法外衣，宗教文明也成为帝国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而流行。近现代西方文明扩张的暴力历史既能解释西方文明与基督教的密切关系，也能说明基于一神教基础的西方文明所具有的零和性特质。

历史上的一些欧洲国家基于自身文化与宗教传统，对外频频发起战争。纵观欧洲历史，几乎就是大半部的宗教战争史，欧洲国家以宗教名义爆发的战争不计其数。由于世界上的大多数宗教之间都具有排他性，且在同一宗教内的不同教派之间竞争和矛盾也水火难容，故宗教战争持续不断，至今仍屡屡发生。可以说，“一神论”的内在核心在于它的排他性，因为信仰其他的宗教者都会被认为是“异端”。其实，西方文明从来都没有间断地涌现“异教徒”，因为凡提出异议的人就是“异教徒”。故此，如果仅从宗教的角度看，西方文明其实是缺乏包容性的。另外，依附于一神论宗教之上的西方文明，其缺陷和不自信的外在表现就是它的攻击性。在他们看来，不铲除所谓的异教徒就没有安全感。索洛维约夫对此就描述说，“烧死异端分子却可以毫无伪善地被看作是相对温柔的刑罚”。<sup>①</sup>

从欧洲基督教扩张的角度我们可以理解和解释欧洲的扩张。使用武力似乎从来没有犹豫过，最著名的就是八次十字军东征以及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爆发的三十年宗教战争。近200年（1096-1291年）的十字军东征与战争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中的零和性特质。正如学者阿克巴·阿赫迈德所说的，“十字军东征创造了至今挥之不去的历史记忆，即一个欧洲长期进攻的记忆。”<sup>②</sup>美国学者朱迪斯·M.本内特《欧洲中世纪史》中写道，“十字军远征聚合了当时的三大时代热潮：宗教、战争和贪欲”。<sup>③</sup>

宗教战争一方面反映了各宗教在教义上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不同社会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的对立。从本质而言，宗教是为统治集团的利益服务的。在政教合一的国家，统治者在战争中往往会煽动宗教信仰的狂热，激起信徒强烈的复仇心理。因此，宗教战争一般都异常激烈和残酷。例如，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各君主国之间除了之前早就存在的利益纠葛之外，更多的是新旧教徒的彼此敌视，这些因素集合在一起就导致欧洲大陆的战争连绵不断。此外，在西方文明眼中，世界其他文明“落后”的地区就是要被征服的地方。例如在15-16世纪，西班牙、葡萄牙入侵南美洲，消灭了印加帝国、阿兹特克帝国这两个南美土著的帝国，将南美洲大部分土地据为己有，并奴役南美洲的土著。当然，这些战争和征服都是借以宗教的名义而进行，充分彰显了西方文明中“零和游戏”的核心特质。

第二，民族国家与零和特质。三十年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也标志欧洲民族国家近代史的开端，国家主要基于民族而建立，这日益让西方文明的内核中具有了另外一个零和特质的因素——民族国家的排他性。民族国家对划定的边界领土实施统治，实现对内和对外的直接控制。与之前的王朝国家相比，民族国家更加珍视其疆域，并赋予其主权为

---

<sup>①</sup> [俄]索洛维约夫著，徐风林译：《俄罗斯与欧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79页。

<sup>②</sup> Rodney Stark, *God's Battalions: The Case for the Crusades*, Harper One, 2009.

<sup>③</sup> [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著，杨宁等译：《欧洲中世纪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243页；Judith M. Bennett, Hollister C. Warren, *Medieval Europe: A Short History*, The McGraw-Hill Companies, Inc. 2006.

“神圣且不可分割的”的至高地位。民族国家强调必须以领土作为其生存的地理空间和载体，但这也导致了各国为争夺“地理”空间而战争不断。主权独立原则在本质上意味着绝对的排他性和零和性。对外而言，民族国家拥有确定且排外的疆界、领土等主权；对内而言，民族国家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统治工具。卢梭也论述了其合法性，认为主权永远是不可转让的，也是不可分割的，<sup>①</sup>这表明民族国家之下的主权具有了绝对排他性特征。二战之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民族国家原则虽然在世界成为各国的主流认同，但也埋下了各国因领土争端而进行零和博弈，进而构成爆发战争的祸根。

随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生根发芽，该理念也带来了民族间的纷争，民族国家观促使各民族争夺建国权利，其背后必然是持续的战争。二战后，西方大国为实现其政治目的，借民族自治之名，竭力支持敌对国的各族群进行分裂活动，并冠以支持“民族独立”之名而公然干涉他国内政。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对独联体国家和地区的活动就是明显例子。<sup>②</sup>如果观察和分析欧洲地图，发现其国家版图具有碎片化和日益细分化的特点，其中的关键原因在于其对民族国家的执意差异化和细分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理念能塑造一个民族的共同认知，但也能让自己与他者实现割裂，具有双刃剑的特性。如查尔斯·蒂利就说，拥有民族主义情怀的法国农民在战争中更容易取得胜利，各国争相效仿，成为历史潮流。<sup>③</sup>迈克尔·霍华德就认为，“欧洲现代国家的版图是在战争的铁砧上打出来的”。<sup>④</sup>摩根索认为，“有多少要建立或维护它们自己国家的民族，就会有多少民族主义。”<sup>⑤</sup>可以说，民族主义是近代民族国家的一个内核，但具有零和性特征。

克利福德·格尔茨认为，民族主义是一个国家的信念基础，<sup>⑥</sup>一个民族如若要建立新的国家，其动力必然是民族诉求。还有学者认为，“民族主义是所有意识形态中最古老且无疑是最具致命性的。”<sup>⑦</sup>从国际政治的冲突性来说，内置于民族主义的具有零和性和排他倾向，这正是现代民族国家的悲剧。同时，民族国家与暴力往往联系在一起。保罗·肯尼迪曾评述到，民族意识滋生让英国人学会恨西班牙，也让瑞典人恨丹麦人。<sup>⑧</sup>民族仇恨与战争之间也由此产生必然联系。

同时，战争对于民族国家也产生了强化作用，战争使得民族增强了对本国的领土认同，明晰了国家之间的领土界限，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容易扩散到世界各地。但是，民族主义对内易产生狭隘的民族自负，导致具有侵略性和大国沙文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暴力、压迫和战争的借口。<sup>⑨</sup>正如索洛维约夫所说的，“为了崇拜自己民族而会直接否定普

<sup>①</sup> [法]卢梭著，李平沅译：《社会契约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29-30页。

<sup>②</sup> 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利用民族分离主义和泛民族主义，长期干涉别国的民族事务。典型的例子有2008年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宣布独立，2006年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地区举行独立公投等，民族自决之名却成为了引发仇恨、分裂，甚至战争等一系列灾难的导火索。

<sup>③</sup> [美]查尔斯·蒂利著，魏洪钟译：《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sup>④</sup> [英]迈克尔·霍华德著，褚律元译：《欧洲历史上的战争》，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sup>⑤</sup>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46-147页，第364页。

<sup>⑥</sup> [美]克利福德·格尔兹著，韩莉译：《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

<sup>⑦</sup> [美]利昂·P·巴拉达特著，张慧芝、张露璐译：《意识形态：起源和影响》，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第49页。

<sup>⑧</sup> [英]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69-70页。

<sup>⑨</sup> 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

世真理思想。”<sup>①</sup>从总体上看，由于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感日趋激烈，自然将对“我者”的认同和“他者”的关系建立在零和博弈基础上，因而导致了各方的不安全感，陷入安全困境，历史上长期不断的相互战争就是彼此二元对立的结果。

应该说，民族国家一方面保护了各国领土和疆域的相对完整性，为各国成立、发展和壮大提供了物质载体；另一方面，民族之间的差异和自我认同，容易将彼此竞争变成了国家间的战争。观察历史和现实，民族主义走出零和博弈是幸运，陷入零和搏杀却是常态。民族国家在领土、主权、核心利益等方面其实是一种零和的关系。

## 二、美国文明的双重特性

美国文明在总体上属于西方文明，但是它的形成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和例外性。美国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一种文明形态，主要是由移民到美洲的欧洲人按照自己的理念在北美新大陆创建起来的。我们可以把美国文明视为宗教改革后的欧洲文明在北美大地上的一种变种。也就是说，美国文明虽然源于西方文明，但是又有别于西方文明。正如美国学者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所认为的，美国独立以后建立的共和国在政治思想和制度上有革命和革新的一面，与中世纪和近代早期以来的西欧政府形式有很大区别。<sup>②</sup>因此，美国文明既有西方文明的零和性特征，也具有不同于西方文明的非零和特征。比较而言，西欧文明更多地保留了历史文化传统及其历史负担，而美国文明并没有沉重的历史负担，它融会了众多移民种族的文化，具有了与欧洲文明不同的特质。

二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像一战结束后那样回到西半球奉行“孤立主义”政策，而是表现出强烈的领导世界的政治意愿。依靠其强大的国力，美国建立了二战后的国际系统，成为霸权国家。学者秦亚青总结了美国护持霸权的三种模式，即理想主义模式、帝国主义模式和现实主义模式。<sup>③</sup>美国的理想主义模式以威尔逊的和平思想为里程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其文明的非零和特质。此外，美国对外干预行为中也存在帝国主义模式，强调经济利益构成美国的最高利益。霍布森认为，19世纪的美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扩张实际上是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考虑。<sup>④</sup>而现实主义模式来源于对人的本质认识，即人的本性中最核心的特征是谋求生存。由于世界政治没有“利维坦”，你死我活的斗争则无法摆脱，安全困境其实来自“相互竞争中的生存冲动所创造的冲突。”<sup>⑤</sup>现实主义模式具有了零和博弈的属性。因此，在美国的外交传统中总体现着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特征。所以，美国的政策总是力图使这两者进行结合。当然，当两者相矛盾时，美国会毫不犹豫选择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但这说明，美国作为霸权国家，它在追求国家利益的对外行为中表现出多元的特性，既有非零和的一面（如理想主义模式），也有零和性的一面（如现实主义模式），美国文明属于半零和型文明。

### （一）美国文明的零和性特征

当英国异教徒来到美洲大陆时，也随之带来了欧洲大陆的文明。正如罗素所认为的，“西

---

<sup>①</sup> [俄]索洛维约夫著，徐凤林译：《俄罗斯与欧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35页。

<sup>②</sup> [美]唐纳德·卡根著，袁永明译：《西方的遗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sup>③</sup> 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家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sup>④</sup> J.A. Hobson, *Imperialis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71, pp.81-84;转引自秦亚青：《霸权体系与国家冲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页。

<sup>⑤</sup> Harry R. Davis and Robert C. Good, eds, *Reinhold Niebuhr on Politics: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Our Age as Expressed in His Writings*,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0, pp.74-78.

---

欧和美国的精神生活实际上具有相同的性质，希腊文化、犹太人的宗教和伦理、现代工业主义是美国文明的三个源头”。<sup>①</sup>同时，美国的建国历程与基督教有很深的关系。在美国的清教徒有强烈的宗教理想，就是要在新大陆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因此，美国的立国原则主要来源于基督信仰和基督教文化。

美国学者玛戈·托德（Margo Todd）认为，作为新教徒的人文主义精髓，其渊源是兼收并蓄的，所关注的问题是世俗的，但在目标上它却是宗教的，在方法论上是实用主义的，在手段上则是激进主义的。<sup>②</sup>文章前面已述，在衡量某一类文明是否具有零和思维的标准中，一神教思维是一个重要的判断指标。美国文化显然是建立于西方文明之上的，它属于西方文明的大范畴，也就自然具有了零和性的特质。例如，美国印第安纳州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在1898年的演讲就赤裸裸地展示了美国文明中的零和性法则，在题为《星条旗在前进》的演讲中，贝弗里奇声称，美国有权统治无能力自治之民族。<sup>③</sup>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评述说，“他们毫不顾忌土著居民，对待他们便像对待动物植物一样。”<sup>④</sup>建国初期，美国在北美土地上对印第安人的驱逐与消灭的确展示了其文明的野蛮性。正如美国学者保罗·艾特伍德（Paul Atwood）所说的，美国的历史是一个充满侵略战争和帝国扩张的历史。战争在提高美国的国际地位，也深刻改变了美国民众的生活方式。<sup>⑤</sup>美国独立后，它的领土不断向西扩张。例如在美国的西进运动过程中，印第安人因反抗而被屠杀，或被驱赶到更偏远的地区。有学者就评述说，美国的“西进运动”也是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

美国的发展史从其扩张性来说就是一部扩张与战争史。美国在历史上有五次较大的战略性扩张时期：第一次以“门罗主义”为标志，美国将其势力扩张至南北美洲；第二次以“门户开放政策”为标志将其实力扩张至全球；第三次以“杜鲁门主义”为标志来挤压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范围；第四次以冷战结束后的“新干涉主义”为标志来充当世界警察；第五次以2001年“9·11”事件为标志把握了全球反恐战争的主导权。每一次扩张，都伴随着战争与对他国的掠夺和占领。如果算上这次特朗普政府采取的“美国优先”政策以及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可以说算是第六次扩张了。<sup>⑥</sup>正如巴西学者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斯·班代拉（Luiz Alberto Moniz Bandeira）在《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一书中所说的，“没有持久的战争状态，其经济就会停止运作，和平有悖于美国的利益”。<sup>⑦</sup>看来，发动大小不同、类型各异的战争符合美国利益，这充分体现了美国文明中的零和性特质。

## （二）美国文明也具有非零和性特质

为什么说，美国文明在其零和性占主导地位的同时，也具有非零和性特征？原因如下：

---

<sup>①</sup> [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北京：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sup>②</sup> [美]玛戈·托德著，刘榜离等译：《清教徒人文主义与清教徒社会秩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sup>③</sup> 他说，“自由主义的统治，即所有合法政府的权力源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仅仅适用于那些有能力自治的民族。我们统治印第安人，没有取得印第安人的同意；我们统治我们的领土，没有取得领土的同意；我们统治我们的孩子们，也没有取得孩子们的同意。美国有权统治无能力自治之民族。”参见 Albert Beveridge, “The March of the Flag,” <http://legacy.fordham.edu/halsall/mod/1898beveridge.asp>.

<sup>④</sup>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198页。

<sup>⑤</sup> [美]保罗·艾特伍德著，张敏等译：《美国战争史：战争如何塑造美国》，北京：新华出版社2013年版。

<sup>⑥</sup> 在特朗普政府的理念下，“美国优先”的贸易立场使中美贸易争端不断升级，其导致的后果是：双方贸易的商品在征税范围和征税额度问题上不断升级，并且存在向其他领域蔓延和恶化的趋势。

<sup>⑦</sup> [巴西]路易斯·阿尔贝托·莫尼·班代拉著，舒建平译：《美帝国的形成：从美西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序言”，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

---

第一，在宗教上，美国的新教出现了从宗教的压制到宗教宽容的转变。美国文明虽然源自西方文明，但美国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对西方文明做了改良和提升，具备了一些非零和特质的比例。在美国社会，自由主义流行，强调权力制衡、接受妥协。关于妥协的重要性，以色列学者艾维榭·玛格里特（Avishai Margalit）认为，“就自由主义理念而言，妥协的精神应是政治的生命之源，妥协的精神之中融入了一种对他人价值和利益的强烈认可，它包含了一种对所不喜欢的信仰和行为的容忍精神。”<sup>①</sup>以自由主义精神立国的美国，实现了从宗教压制到宗教宽容的转变。当初那些从欧洲来到美洲的“清教徒”都曾受到过宗教的迫害，所以他们更珍视政教分离的原则对建立全新国家的重要性。托克维尔就对美国政教分离政策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宗教不需要依靠政治权力的帮助而生存。而如果给予政治权力以帮助，则会导致自己灭亡”。<sup>②</sup>

在宗教对社会和政治的地位问题上，1777年，托马斯·杰斐逊起草了《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并使这一法规在1786年的州议会上获得通过，实现了政教分离，该法规常被称为是美国宪法的宗教条文的前身，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直到现在仍然是美国处理宗教纠纷的主要依据。杰斐逊还于1802年在一封信中提到要在“教会和政府之间树立一道隔离墙”。<sup>③</sup>道格拉斯·F.凯利也认为，国家与教会是不同的治理权柄，共同服从在上帝之下，彼此对立，彼此不能控制和裁判。这显然要归功于两百年来加尔文主义者在北美对信仰自由和公民盟约的实践。<sup>④</sup>此外，从建国开始到现在，美国不同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的移民经过联合、博弈、协调、妥协造就了多元的新文明的宗教精神与自由意识。这使得宗教上的唯一排他性程度大大减弱，这也使得美国文明的内核中具有了非零和的特质。

第二，美国没有单一民族的羁绊。美国在民族构成上可以说是一个超民族国家。北美地区的土著人、殖民者和贩卖来的黑奴构成了这块新大陆的居民。在这样一个多元复杂的社会，人们不能不学着彼此宽容地和平共处，否则无法正常生活，社会和国家也无法前行。亨廷顿认为，美国种族和文化特征的核心可以用三种比喻来形容，即熔炉理论、番茄汤理论和沙拉理论。熔炉理论认为，各民族的个人都融合成一种新人，这种融合和再造不但包括种族之间的通婚，还包括创建一种新的共同文化。番茄汤理论更强调的是文化上的同化。与欧洲不同之处是“破坏性竞争的刺被拔掉了，结果是美国不会是一个民族，而是超民族……”。<sup>⑤</sup>如果从民族性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没有美利坚民族，只有美利坚理念（American Idea）。<sup>⑥</sup>

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也不像中国和印度，拥有悠久的历史基础作为其文化的共同体。美国除了拥有一个共同的政府之外，各种族和各类宗教的差异性大于共同性。美国的国家认

---

<sup>①</sup> [以色列]艾维榭·玛格里特著，陈特安等译：《妥协与卑劣妥协》，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2年版，第158页。

<sup>②</sup> [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5页。

<sup>③</sup> Jefferson, Thomas, "Jefferson's Letter to the Danbury Baptists: The Final Letter," <http://www.loc.gov/loc/lcib/9806/danpre.html>.

<sup>④</sup> [美]道格拉斯·F.凯利博士著，王怡等译：《自由的崛起：16-18世纪，加尔文主义和五个政府的形成》，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sup>⑤</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

<sup>⑥</sup> Michael Lind, *The Next American Nation: The New Nationalism and the Fourth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5, p.3.

---

同重在信念和思想，亨廷顿把这个理念称之为“美利坚人”。<sup>①</sup>汉斯·库恩（Hans Kohn）也指出，美国没有单独民族的要素，如没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宗教、共同的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上形成的共同的领土等，联结美国的是建立在一种理念之上的美国认同。<sup>②</sup>我国学者费孝通认为，美国人是由世界各地的许多民族的移民构成的，美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是民族拼盘。<sup>③</sup>王立新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在自由主义政治理想的认同上找到了公约数，把“自由的捍卫者”这一特征作为美国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性和身份的标志。<sup>④</sup>可与说，美国用文化和价值观认同取代了民族认同，实现了各民族国家所追求的内容。

第三，美国在哲学取向上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的实用主义哲学取向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人对事物的价值判断。美国人基于在美洲大陆的开拓实践和国家产生经历，使得他们在社会生活中鲜明地表现出这一特征。基辛格曾对此评价道，没有一个国家“在日常生活中比美国更务实……”<sup>⑤</sup>可以说，实用主义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影响着美国人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美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实用主义强调有用性，因此也特别注重现实利益。对此，实用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同时，美国的实用主义表面上看似简单、功用，实际上是多元价值和国内各民族的宽容精神，实用主义也便显出了善于妥协的特征。

国家认同上的包容性以及哲学意义上的实用主义使美国在其历史进程中具有和平改良的传统。改良强调部分修正错误，而不是全面否定，一般会通过妥协和立法来加以改革而不是暴力革命。改良主义模式可以说一直贯穿着美国的历史进程，这就使美国改革可以避免因革命暴力而引发的流血与倒退。和平改良的思想传统集中反映出美国人的理性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美国文明中将真理视为有效用的假设，以行动的效果来检验其真伪的思维就是美国文明非零和特质的表现。

### 三、中美比较：文明型国家与非零和性特质

中华文明与美国文明存在较大差异，这是不用赘述的事实。但是，如果我们从历史传统、文明属性和哲学特性的角度分析，中美两国的文明存在一些共性特征，具体如下：

#### （一）中美两国都是文明型国家

从渊源上看，美国的总统制共和制源于古罗马。有学者就认为，“这艘来自古代的航船一直向西航行，在中途把番号改成了‘五月花号’，然后在新大陆（北美大陆）卸下了一个新罗马共和国。”<sup>⑥</sup>学者金灿荣认为，“美国的主流文明仍是来源于欧洲的西方文明，欧洲文明的几大要素都在今天美国人的生活中存在着。”<sup>⑦</sup>如果从文明的继承、发展和延续的角度来看，把美国视为文明型国家是有道理的。也就说，虽然美国建国时间不到300年，但美国文明的衣钵源自古罗马，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文明也具有历史的悠久性。

作为四大文明古之一的中国，其文明上下统领超过五千年，在类别上自然属于文明型国

---

<sup>①</sup>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程克雄译：《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北京：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91页。

<sup>②</sup> Hans Kohn, *American Nationalism: An Interpretative Essay*, New York: Collier Books, 1961, pp.3, 8-9.

<sup>③</sup> 费孝通：《美国人的性格》，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4页。

<sup>④</sup> 王立新：《美国国家认同的形成及其对美国外交的影响》，载《历史研究》，2003年4期，第124-136页。

<sup>⑤</sup> [美]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sup>⑥</sup> 林国荣：《罗马史随想》，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5年版，第145页。

<sup>⑦</sup> 金灿荣：《文明与国家：中美比较中的定位标准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第1页。

---

家。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的，中国人自成一体，天下主义和世界主义将中国组织在以文明为基准的国家里。因此，中华文明从本质上是一个文明的概念，而不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概念。<sup>①</sup>冯友兰也认为，“从中国古代起……中国人的民族意识更多来自文化，而不是来自政治。”<sup>②</sup>张维为认为，中国在本质上就是一个文明型国家。<sup>③</sup>英国学者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s）也认为，中国人把自己视为文明国家。<sup>④</sup>

基于文明基础之上的国家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与基于民族国家基础之上的国家在对待他者的关系是不尽相同的。相较民族型国家，文明型国家更能包容一个多元的体系。文明型国家相信自己能起到包容与融合的作用，能化外为己。美国的外来移民可以在美国实现美国梦而成为美国公民，而中国古代的“外夷与外族”也能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实现“各美其美”的包容性，<sup>⑤</sup>这些就是文明型国家的品性所在。所以，在文明型国家之间，由于其文明内核中都包含有非零和特质的“种子”。中国历来以“和合”特质与外界交往，如果在压力环境和条件合适时，美国文明中非零和特质的种子也会发芽成长，进而表现出合作与包容的一面。

## （二）两国的文明体系中都存在不同比重的非零和文明的特质。

从美国的对外政策看，美国政治历史中存在自由主义的传统。有学者对此总结说，“美国从其建国之初就已是一个自由主义社会，其自由主义传统已是世界上最牢固的传统之一”。<sup>⑥</sup>自由主义传统其实与非零和思维存在共同点，自由主义者把世界政治视为非零和的关系。自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国际政治在层次上进行了升华，在其中加入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特征，倡导在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国家通过国际机制进行合作。<sup>⑦</sup>也就是说，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中孕育着非零和特质的种子，体现在文明范式上就是“非战”的特征。王立新认为，洛克的政治哲学对美国人的国际政治观念影响深远，洛克所描述的自然状态的理论被应用到了国际政治，美国的对外关系中具有了法制主义与道德主义的风格。<sup>⑧</sup>换句话说，美国文明体系中除了有一神论宗教外，还有更多的超民族、多种族以及多元性特征，这就为它的文明的包容性提供了可能，这也是美国文明具有非零和性特质的原因所在。

美国文明的非零和思维主要体现其制度方面安排方面。在凡尔赛和会上，威尔逊总统提出的民族自决和集体安全理念，“威尔逊十四点计划”使美国一跃掌握了世界伦理的制高点，此时的美国文明具有了某些非零和性品质。二战后，美国所建立的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等一系列国际制度对之前的国际秩序做了诸多包容性改进，而这些制度安排强调多边主义、合作妥协等思想，虽然美国主要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但也体现了美国文明中的非零和性特质。

相对于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则具有其悠久性、持续性和包容性等特征。从中华文明的演

---

<sup>①</sup> 刘涛：《汤因比的预言：中国文明将照亮21世纪》，《社会观察》，2013年第3期。

<sup>②</sup> 冯友兰著，赵复三译：《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sup>③</sup> 参见张维为：《中国震撼：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张维为：《中国是世界唯一“文明型国家”》，载《环球时报》，2010年5月24日。

<sup>④</sup> [英]马丁·雅克著：《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的崛起和西方世界的衰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第161、165页。

<sup>⑤</sup> 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sup>⑥</sup> [美]路易斯·哈茨著，张敏谦译：《美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sup>⑦</sup> 金灿荣、赵远良：《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条件探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3期。

<sup>⑧</sup>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4-165页。

---

进历史看,任何外来文化传入中国,其最后的归宿是与中华文明相互融合,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国学者陈来认为,中华文明核心价值有四大特点:责任先于自由,义务先于权利,社群高于个人,和谐高于冲突。其中的仁爱原则、社群取向以及对王道世界的推崇等价值在过去乃至现代都具有普遍意义。<sup>①</sup>国外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也认为,中国的儒家思想虽然不适用于群雄争霸条件下必要的经济政治,但这一思想却摒弃了攻击性的外交政策。<sup>②</sup>可以说,中华文明的品质重在“和合”二字,体现的是非零和的特质。

中华文明中所秉持的“天下”理想追求的是一种世界和平主义的秩序,这完全区别于“西方中心主义”中的零和性内核。天下体系表现出了中华文明的内敛性、和平性。此外,中国在政治文化传统是一个淡于宗教、远于宗教战争的国家。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中国本身具有一种内聚性,从数千年前中国文明的早期阶段就有了”。<sup>③</sup>理查德·伯恩斯坦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追求一种和谐共生精神,中国并不谋求把它的生活方式推广到其他国家。<sup>④</sup>因为和谐高于冲突,相比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弗兰克·古德诺(Frank J. Goodnow)在《解析中国》一书指出,中国是和平主义的。他说:“中国直到受到西方入侵之前一直是和平主义的。中国文化具有恒定性的特点,这自然会产生出一种和平主义的倾向”。<sup>⑤</sup>

概括一下中美两国文明体的特质就是,中华文明属于非零和性文明,而美国文明总体上属于零和性文明,但也拥有较大比例的非零和性特质,这将为中美文明更好交流打下基础。

### (三)中美文明的竞合是洛克式博弈关系。

美国冷战学者加迪斯认为,大国的地位是短暂的,过度扩张会导致国家的衰亡,但历史并不安排大国同时性与对称性地衰落。过去的经验表明,大国意识到它要衰落之时是一个充满危险的深刻,它要早在物质力量本身耗尽之前表现出古怪甚至绝望的行为。所以,保持大国的稳定需要承认大国不仅与对手的生存相关,而且与对手的成功和繁荣休戚相关。<sup>⑥</sup>如何保持大国稳定,或许经贸关系的进一步加深与密切,彼此形成相互依赖关系或是办法之一。

在中国近40多年的和平发展过程中,中美关系出现的是一种合作共赢的局面,即出现的是“中国发展也导致美国得利”的现象。这个共生共荣的新元素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基础。具体来说,美国视中国为世界最大的生产国而长期依赖中国,中国提供了质优价廉的商品向美国和世界出口,用所换取的大量美元外汇购买美国的国债,以支持美国的经济增长。<sup>⑦</sup>中美这种发展与得利正相关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文明间合作与协调的多利局面。当然,任何事物都有辩证性,当中美关系联系日益密切也会产生新的问题,例如双方贸易上的顺差与逆差问题以及数量和规模等问题。中美最近发生的经贸冲突就体现了中美博弈的复杂

---

<sup>①</sup> 陈来:《中华文明的核心价值——国学流变与传统价值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sup>②</sup>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阎振江、孟翰译:《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sup>③</sup>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译:《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6页。

<sup>④</sup> [美]理查德·伯恩斯坦,罗斯·芒罗著,隋丽君,张胜平、任美芬译:《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sup>⑤</sup> [美]弗兰克·古德诺著,蔡向阳等译:《解析中国》,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6-17页。

<sup>⑥</sup> [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著,潘亚玲译:《长和平——冷战史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15-316页。

<sup>⑦</sup> Stephen Roach, “Chinese Reform U.S. Stasis,”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7, 2013.

性问题。

当然，在与中国交往过程中，美国文明中的零和性特质也不时显现出来。例如，在中美建交之前，中美之间还发生过数次军事冲突和战争，如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等。由于中国当时缺乏对美国军事威慑如核威慑手段，美国文明体现更多的是零和性特质，中美的关系在此阶段大致处于霍布斯式博弈的政治结构状态。随着1979年中美建交以及中国在军事上具备了核威慑能力，中美关系进入正常化阶段，美国文明中的非零和特质展示出来，中美的互动也开始以洛克式博弈为主。

如果从历史的长时间角度看，中国每一次复兴都成了“天下体系”的中心。如何看待中华文明的复兴，西方的一些知名学者则充满期待。例如，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认为，中国对于全人类的未来将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sup>①</sup>中国是一个没有征服野心的国家。中国在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在被人认为所不可避免的人类统一过程中将发挥主导作用。<sup>②</sup>汤因比预言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他说世界的和平统一必将以地理和文化轴为中心。这个主轴不在美国，而在东亚。中国人和东亚各民族合作，可能要发挥主导作用。<sup>③</sup>无独有偶，另一位西方大学者，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理论的达尔文（Darwin）也曾经讲过，相对于其他文明，中华文明更具有典范意义与和平意义。<sup>④</sup>

其实，东西方这两大不同类型的文明早就相遇相知了。近百年以来，中国经历了从积贫积弱到和平发展的不同阶段，中华文明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从示弱到崛起的过程，中华文明与美国文明的交流也展示出不同的博弈状态，其博弈关系如表1所示：

**表1 中美两种文明的博弈的关系**

	美国文明（零和性特质占主导）	美国文明（非零和性特质占主导）
中华文明弱势	霍布斯式博弈：自1840年鸦片战争至中美建交。	未出现
中华文明崛起	洛克式博弈：中美关系现状	洛克式博弈，甚至出现康德式博弈

表1显示，在中华文明弱势的情况下，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文明（包括美国文明）在交往中处于落后挨打的状态，中美博弈属于霍布斯博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中国核大国地位的确立，特别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而崛起的中华文明，开始在复兴的道路上迈进，中美博弈就处于洛克式博弈状态，两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从未来的视角看，随着中华文明的进一步崛起，中美两种文明将处于共融发展的状态，进入康德合作模式。如何与中华文明相处？英国哲学家罗素就指出，“不借鉴东方智慧，西方的文明就没有指望了”。<sup>⑤</sup>这一句话也点出

<sup>①</sup> [日]池田大作：《汤因比：来世我愿生在中国》，<http://www.dooo.cc/2014/06/29666.shtml>。

<sup>②</sup> 转引自周笃文：《深耕国学原典 厚植诗词基因》，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9月12日。同时可参阅[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87页。

<sup>③</sup> [英]汤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294页。

<sup>④</sup> 张胜友：《沉睡的民族已醒来》，载《人民日报》，2014年10月16日；中央电视台：《百年潮·中国梦》（解说词），第三集“中国精神”，[http://zjrb.zjol.com.cn/html/2014-05/29/content\\_2677141.htm](http://zjrb.zjol.com.cn/html/2014-05/29/content_2677141.htm)。

<sup>⑤</sup> [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7-8页。

---

了美国文明与中华文明的相处之道。

总之，由于中华文明所具有的非零和性特质，无论其在世界政治中是否占主导地位，它都具有其和合的特质，从来都没有从零和博弈的角度对待其他文明。在全球化日益密切的今天，中华文明在与西方文明（包括美国文明）的博弈中，都展出自己包容和平的特质。因此，中美文明竞合的结果就是出现包容互鉴，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

#### 四、中美贸易博弈无关“文明冲突”

2016年，特朗普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纲领成功就任美国总统，在其“美国优先”的理念下，美国国内的经济民粹主义思潮日益兴起。受其影响，中美关系也迎来挑战，两国的经贸关系也出现了明显恶化的态势。目前学界对中美贸易战的特征有不同的描述，如认为贸易战是持久战、<sup>①</sup>贸易战必然会导致中美“冷战”等。更有甚者，美国有学者将中美贸易博弈上升为“文明的冲突”。例如，美国国务院负责政策规划的主管官员基伦·斯金纳(Kiron K. Skinner)于2019年4月29日在华盛顿参加“未来安全论坛”时表示，美国正在制订一项针对中国的战略，该战略基于“与一个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在谈到与中国的关系时，她声称“(与中国的竞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对华竞争是“文明的冲突”。<sup>②</sup>

其实，斯金纳关于“文明冲突”论恰恰是美国文明中零和性特质的体现，比较全面展示了其文明的双重性特征。斯金纳的言论并无新意，在本质上是对亨廷顿所述的基督教文明与儒家文明冲突的老调重弹，可谓成渣泛起。当然，斯金纳的言论立刻遭到美国国内舆论界的广泛质疑，认为这种言论只是为了迎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旨在论证特朗普政府对华全面强硬的合理性，过度夸大中国“威胁”。

在本质上来说，国际关系是一种各国对利益进行博弈的关系。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与中国的关系仍然遵循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目前中美贸易博弈（或曰贸易战）其实反映出的中美两国各自的利益诉求，是一种正常的外交博弈行为，并不代表中美文明的冲突。如果按照斯金纳的逻辑，但凡贸易冲突或者国家间竞争就都可演绎成文明冲突，在美国与世界大国几乎都存在贸易摩擦的情况下，这是否也就意味着美国文明与所有的文明都存在文明冲突？倘若如此，美国文明与其母文明（欧洲文明）也存在文明冲突，因为美国与欧盟在诸多问题上都存在贸易摩擦和冲突。从这个角度看，斯金纳的观点不值一驳。应该说，美国部分学者或官员利用这种观点来激化矛盾，把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和博弈上升到文明的高度，这其实只是展示了美国文明中的零和性特质，并不代表冲突的必然结果。

事实上，美国社会各界对“中美文明冲突”的观点已经进行了批判和反思。这就涉及另外一个问题，即文明的方向该如何演进？文明之间的关系是共生与相容，抑或敌对与排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事关人类的和平。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告诉我们，以智慧思考领悟真理、

---

<sup>①</sup> 张燕生：《中美贸易战是持久战 中国要坚持做好自己的事情》，<http://news.hexun.com/2018-07-08/193394449.html>；余永定：《中美贸易战是一场持久战》，[http://www.iwep.org.cn/xscg/xscg\\_sp/201806/t20180617\\_4369217.shtml](http://www.iwep.org.cn/xscg/xscg_sp/201806/t20180617_4369217.shtml)；拉赫曼：《美中贸易对抗将是“持久战”》，<http://www.ftchinese.com/premium/001079380?exclusive&archive>。

<sup>②</sup> Joel Gehrke, “State Department preparing for clash of civilizations with China”, Washington Examiner, <https://www.washingtonexaminer.com/policy/defense-national-security/state-department-preparing-for-clash-of-civilizations-with-china>。

---

以中道的精神承载世界、以包容的心胸容纳他人，如此方能进入高一阶段的文明。费孝通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各个文明得以“不朽”的最可靠的保证，无论强势文明，还是弱势文明，只有通过交流、理解、共享、融合，世界文明方能共存共荣，这也是唯一出路。<sup>①</sup>其美国的有志之士也洞察到这一点，例如基辛格就认为，中美两国在未来可以实现共同演化。<sup>②</sup>中美关系的发展与定位需要由两国共同完成，而不是由美国单枪匹马地建立世界秩序。中美既要围绕各自利益展开竞争，又要避免大国冲突，其博弈类型选择必然是洛克式博弈。在中美洛克式政治结构之下，中美两个核国家的政治关系被置于“维持自我生存和允许对方生存”的状态之中，合作与竞争并存是主要内容。就中华文明与美国文明的博弈态势来看，其未来方向是形成共生共容的博弈状态，其特点是相互包容与相互补充。其实，英国思想家罗素早就认识到了中西文明的互补性，在他看来，中西交流可以互补。他说，中国人如能对西方文明扬善弃恶，再结合自身的传统文化，必将取得辉煌的成就。<sup>③</sup>因此，罗素对中华文明中能够给人类和平带来希望这一点深信不疑。

在文明的互动关系上，由于中华文明的兴起，国际政治会表现出新的特征。当非零和型文明（如中华文明）逐渐勃兴于世界舞台时，世界政治将呈现出非零和博弈的政治互动模式，从“人人为战”的霍布斯式的恶性竞争时代进入到合作互利的洛克式良性竞争时代，这必将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博弈注入新的正能量。中华文明范畴内的国际关系原则会更强调以“和合”为中心，强调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近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就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良性互动的一个例证。可以说，中华文明给世界提供了一种包含着和平与良性竞争的极大进步可能。这种基于非零和文明博弈基础上的大国关系，可以为中美两国未来提供洛克式博弈的有利条件，国际关系的霍布斯法则在中美文明博弈中也并不是必然选项，中美文明中各自的非零和特质将内嵌于中美政治博弈中。

---

<sup>①</sup> 费孝通：《中国文化的重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95-296页。

<sup>②</sup> [美]亨利·基辛格著，胡利平等译：《世界秩序》，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489页。

<sup>③</sup> [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